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在向阳湖难忘的日子
牛棚日记
向阳日记
一莫须有的一五一六一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忆干校 怀孟超
忆沈从文先生
——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旧梦重温时

湖北文史资料

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

一九九九年第二辑(总第五十九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0202947

K296.3

12.5

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

《湖北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九辑

《咸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201029476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咸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71280000

1999/2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季刊)

1999 年第 2 辑 (总第 59 辑)

主办: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 《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 湖北省政协印制室

发行: 《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1999 年 5 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 12.6 千字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6-3285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67/K

定价: 6.50 元

目 录

“五 七” 干 校 生 活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李晓祥(1)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萧 乾(5)
实话实说话“干校”	郝孚逸(12)
牛棚日记(节选)	陈白尘(19)
向阳日记(节选)	张光年(29)
干校劳动的回忆	韦君宜(36)
“莫须有”的“五一六”	洁 泯(39)
干校挨斗记	阎 纲(43)
向阳湖点滴	顾学颢(45)
重访文化部“五七”干校记感	张初考(55)
一片冰心在向阳	李城外(58)
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文洁若(61)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陈早春(68)
忆干校 怀孟超	楼适夷(75)
向阳湖旧事	鲁 原(78)
忆沈从文先生	张学琦(83)
侯金镜在向阳湖	何 锐(87)
记王子野两次死里逃生	张惠卿(90)

郭小川写《杨家大传》《楠竹歌》《花纹歌》

的前前后后	陈大银(94)
赵辛初的咸宁情	陈大银(100)
袁涌进先生在均县“五七”干校	刘永愉(106)
“五七”路上向阳花	杨静远(109)
“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李城外(122)

向 阳 湖 文 化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向阳湖文化

开发提案的由来	李城外(126)
“城外旋风”	柯于明(130)
旧梦重温时	李 辉(133)
致李辉先生的一封信	李城外(154)

李晓祥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 “五七”干校

“文革”中期，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翻译家、出版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及其家属下放鄂南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生活。我当时任黄冈军分区副政委，调来担任咸宁“五七”干校的负责人之一，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一些，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干校的背景和组织情况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写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庆安县柳河率先出现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接受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他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咸宁“五七”干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9年9月，文化部所属机关六千多文化人及家属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出发来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当时叫关阳湖）建立“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向阳湖的四五二高地。当时把干校选在咸宁，主要恐怕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咸宁靠近京广线，交通便利；二

是有宽广的湖面，可以围垦造田。

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湖北省军区从所属单位抽调了 73 人，组建成了“五七”干校军宣队，接替原北京军区设在文化部的军宣队。其中师职 1 人，团职 7 人，科级 10 人，参谋干事 48 人，排以下干部 7 人。1970 年 6 月 2 日进驻干校，随即与文化部带队干部组织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徐光霄（原文化部副部长，驻北京）；副组长：李晓祥（第一副组长）、杨岩（原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行政）、聂鸣九（原文化部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机关）、常萍（原文化部办公室处级干部，主管运动）和刘青山（文化部一般干部）。下设办公室（9 人）、政工组（7 人，组长刘剑青）、专案组（人数记不清了）、生产组（16 人，组长田惠普）、基建组（15 人）、建筑材料组（15 人）、食堂（6 人）、直属单位（18 人）、中转站（18 人）、木工排（32 人）、汽车修配厂（22 人）和运输队、机耕队、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丹江口老弱病残休养所等。

“五七”战士又分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具体情况是：第一大队，包括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计财司、联络司、教育司、政研室、群文司，以及红旗越剧团、勇进评剧团等；第二大队，包括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第三大队，包括新华书店及北京发行所、中国印刷公司、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含“荣宝斋”）等；第四大队，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第五大队，包括中国电影公司、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等。

建校初期，在武昌金口和乌龙泉设有家属连，还有两个连队分别驻汀泗烧砖瓦和驻双溪挖煤，另在鄂西北设有丹江分校。从 1971 年起，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 1973 年，大部分学员离校，1974 年 12 月 16 日，干校解散，合并到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天津静海团

泊洼)。

干校的生产、生活情况

6000 文化人下放到咸宁,首要的问题是吃、住问题。先是住在老乡家里,安顿好后,就开始建房和围湖造田。鄂南农村,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尤其是围湖时,经常打滑摔跤。当时围湖最大的工程是修堤坝,干校负责 6500 米,任务很艰巨,出现了多次塌方,经过“五七”干校广大干部和民工的艰苦努力,终于截流成功。这一时期我还未到任,是听其他同志讲的。向阳湖“五七”干校围湖造田大约有 1800 亩,其中旱地 200 亩,水田 1600 亩。旱地主要种经济作物、油料作物,水田种水稻:早稻和晚稻。

此时,中央办公厅设在江西的干校打起了“四自给”(粮油肉菜)的旗帜,号召当年要把干校的投资挣回来,并做到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咸宁“五七”干校迫于形势,也跟着要求“四自给”。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掀起一个比学赶超创模范的活动。咸宁干校几年共评出四个先进连队:九连(故宫博物院,130 人,连长李文善,指导员张文喜)、十三连(人民出版社和农村读物出版社,190 人,连长兼指导员谭吐)、十五连(商务印书馆,189 人,连长黄国平,指导员汝晓中)和十九连(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114 人,连长秦楚刚,指导员杨景全)。

另外,还评出了 6 个劳模:张进学(原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宋真(女,商务印书馆干部)、冯振山(故宫博物院干部)、邢显庭(某出版社领导)、康鸣录和苏祥福(单位记不清了)。还有一个炊事员姓殷,立过功。这些都是省军区党委授予的荣誉,有正式的文件和奖状。

关于运动和专案情况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

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向阳湖文化人最不愿触及的痛心的回忆。

当时咸宁干校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深挖“五一六”分子。“五一六”的由来，据说是因为一些人冲击外交部和英代办（英国驻北京办事处）引起的，早在文化部下放前就开始搜集材料。干校各个连队都有所谓“五一六”分子，某幻灯厂的张秀文是受冲击最厉害的。校部对他还进行了大批判，但没有定性。因为省里有个讲话精神，叫“三不急于”：不急于定性，不急于戴帽，不急于作结论。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对所有下放的文化干部都没有作定性处理。因为历史审查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当时看了一部分人的档案，觉得牵涉面太广，有些甚至牵涉到中央领导同志，我们怎么定性呢？再说也没有钱去搞外调，所以下放干部都没有作历史审查。自我检查过关，渐渐解放出一批人，像赵辛初同志就是这样的。干校解散后，张秀文所在的连队连长曾给我写信，表示批张秀文自己有责任，思想有压力。我当时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这个责任应由干校校部来负。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

1973年8月，我被调去咸宁军分区主持工作，省军区决定由咸宁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连珍同志接替我在干校的职务，我于是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王万声到国务院向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汇报工作。之后，就回到咸宁军分区。临离开干校时，干校还开了欢送会。

（石雁飞 记录整理）

萧 乾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红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声鸡鸣犬吠，到处

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有看见提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了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叔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幽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了,下一

步就围湖造田了。

因此,每天早饭后我们就排队去工地。头几个月差不多成天都同砖瓦水泥打交道。湖还没围起,砖依然能从水路运到湖边,然后卸下来,用大车拉到工地上。

卸砖用的夹子,一夹就四块,递砖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挨个儿往下传。年轻力壮的干起来从容不迫,年老体弱的难免就气喘吁吁。活儿往往按政治条件来分配,像我那样的摘帽“右派”以及其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自然比革命群众还得多干些。遇到运砖瓦木料的船半夜才到达湖边,连长照例就站在门外,喊名字。喊到的即便已经入睡或是生点小病,也得乖乖爬起来去当差。湖北雨水多,湖边路窄泥泞。已经干了一天活再爬起来,有时真吃不消。一次排长派我下河捞泥,那是特壮劳力才能胜任的重活。洁若马上以我没带水田靴为由,替我搪住了,事后她还在会上挨了批。

有一天派我去大队部仓库领油毡。一看,管仓库的是一本大型外文字典的编著者。他因患癌症,锯掉了右腿,竟然也得下来。看他老远拿着钥匙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大吃一惊。每逢我干得吃力而要发牢骚时,就用他来鞭策自己。

房子由北往南盖,按平方米计算的建筑费,越降越低。起初全用砖,后改为一半用土坯,最后索性统统用土坯盖了——土话叫作“干打垒”。据说可以用“干打垒”盖几层楼房。房子随盖随往里搬人。直到老弱病残搬到另一个地区后,洁若和我才分到尽南头那排中的一间,桐儿也搬进来,我们三口团聚,又算是有了个家。

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因时令而异。寒冬时喜欢,酷暑时怕。从没听说过谁怕月亮。嫦娥的神话多美!人们还喜欢用圆月象征家庭团圆。因为那时军宣队就会半夜里忽然吹哨“拉练”。拉练是正规部队里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训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在军宣队管理下,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

我往往是最后一个站上队的，一边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所以走起“五七”道路，人反常了。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下来之后，我们两个孩子的发展大不相同。儿子还在小学，先在咸宁住宿，继续读书，偶尔乘大卡车回到连里，和父母共度周末。只比他大一岁九个月的姐姐，只因为已上了初中，下火车的第二天，就被编入了劳动大军。

荔子思想单纯，素性好强。自从亲眼看到家被抄，父亲挨斗之后，她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狠抓政治。首先就是要学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雷锋和王杰。连里什么活儿重，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士一道死命地干，下工后，旁人换洗干净休息了，她却又去侍候连里一位绰号“圣人”的一家数口。“圣人”难得找到这么个小女仆，就贴大字报赞扬她是“活雷锋”。

“圣人”是位国学家，年轻时熟读诗书，生平最得意是几首歌颂大炼钢铁吃食堂的打油诗，他又是全连背诵“老三篇”的名手。他个子高大，嗓音宏亮，背时抑扬顿挫，表情生动，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一下子又像位活张思德，一下子又像是老愚公再世。“圣人”不但擅长舞文弄墨，还手巧心细，精于修理。下来之前他早有准备，还特置了一套修理工具。初到咸宁，听说军宣队首长的表不走了，他赶忙把活计张罗到手，连夜在油灯下给修好，又亲自捧到连部。于是，当我们风里雨里趟着沼泽地，赤脚下稻田时，连部却分配他坐在宿舍旁的一间草棚里，专管修理。要是连里有头有脸的人的手电筒什么的坏了，不用催促，他会马上给修好。一般“五七”战士送来的，就要看“圣人”的兴致了。

小荔自从听到这位“圣人”朗诵“老三篇”，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主动搬去和“圣人”的几位千金同住一屋，为他们洗洗涮涮。住在隔壁的几个女干部愤愤不平地对洁若说：“你的女儿太

老实，白天劳动，下工后还要为那么多人洗衣到深夜，身体要拖垮的呀！”有一次，洁若正在吃晚饭，旧领导班子的一个女党员来找她说：“这几个女孩子真不像话，我刚刚看见萧荔在塘里给他们洗衣刷鞋，他们自己吃饱了，也不去替换一下，让她回来吃饭，还在那里嘻嘻哈哈！”

原来包括这位女党员的女儿在内的其他几个女孩子也找到了窍门，都来利用小荔的劳动力了，但女党员作为“走资派”被揪斗了几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敢管。“圣人”告诉小荔，学雷锋贵在持久和彻底，不可听了流言蜚语就有所松懈。我们那个苦行僧的女儿听了，服务得就更周到了。

桐儿却绝不认为只因为父母在“文革”中被揪斗，就该由他来赎罪。他小学毕业时，连队办的向阳中学开始正规化了，所以他几乎没耽误功课。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民歌的长文，受到国语老师的赞赏，还跟着我学起英文来。他没当成长白山的猎手，却成为那一带的捕蛇能手。三年里，他足捕了两百多条蛇，并特别喜欢徒手去捉毒蛇。一回，他给眼镜蛇咬破了手指，偷偷去医务室打针吃药才好。他有时晚间提了几只牛蛙回屋，于是，一家三口就打起牙祭。

五个连几百口子住在一个山头上，吃水是大问题。幸好坡下就是湖水，尽管那是几十头水牯的浴池，也得把水绞上来食用。这样，就请来一位柴油机师傅，他需要个助手。试了几个人都没入选，他单单看中了我这个笨货。于是，我由班上抽出来，当上这个美差。

以前，早饭后一听连长吹口哨，我也像旁人一样，就扛了农具去站队。然后由连长带头喊上几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随大队向地里走去。如今，我却站在湖边柴油机席棚外，看着大队走过。

有时，大队过去后不久，就见连长扛着鱼网到湖边来打鱼了，随身还带着连里的一位女干部。这位凭出身和武斗本事由基层升成领导的连长，最喜打鱼。由连里出一大笔钱买了张鱼网，供他散心。打到了他可以改善生活，打不到也别有一番乐趣。

一天他正要下网，只见山后拥出百十口子农民。原来自从湖里的鱼改归县里经营后，附近社员好不服气，就由生产队队长带头下来抢鱼。连长见势不妙，赶紧收网奔回。

随着围湖造田局势的展开，干校同当地农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口粮以外仅有的一点副业收入，靠的就是这个湖。湖里可以捕到鱼虾，还产莲藕。湖水一干，干校在高处种上高粱，低处开成水田。于是，半夜里成车地偷走玉米的事发生了，甚至猪圈里也丢了肥猪。

这时，中央办公厅设在江西的干校打起“四自给”（粮油肉菜）的旗帜，并号召当年要把干校投资挣回来，并做到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这明明是抛开劳动锻炼的原旨，硬逼着我们这批耍了一辈子笔杆的人去靠土地生存。我们连自然也不甘人后，响应号召，把劳动量加强到吃不消的程度。

我是将满六十时下干校的，但不知怎地，派活时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要求我一个人挑两满桶粪，而比我年轻两岁的，只消两个人抬半桶。雨天或假日派公差，也总短不了我。有一次洁若站在山墙下递灰浆，看我挑两大桶灰浆趑趄趑趄走来，便央求排长，让她跟我换了工。但我们二人并不经常在一起干活，我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

我们连一次“双抢”，第一天黎明前下湖，第三天中午回来。五十来个小时不分体力年龄，昼夜奋战。我干的算是轻活：把打谷机吐出的稻草拉到草垛上。夜间两班倒，拉一小时，哨子一吹，就歪倒在草垛上喘口气，哨子又一吹，就爬起来再拉。第三天上午，我和另外两个也已到六十的终于垮了下来。下工时，大队长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睬也不睬。还是一位“五七”战士的爱人——从外单位来的一位好心的女同志，扶我回去的。

武汉第二医院的大夫听了心音，看了心电图，不住地摇头。他皱着眉头，在我的病历上写了“冠心病”三个字。

对我，那不啻是一纸判决书。

那以后，要我改值夜班，那阵子连里正死了人，浩若说高低也要我活着回去。于是，她白天下地，晚上还经常帮我值班。

这时，一位从延安来的诗人以老干部身份替大家求情了。这下子军宣队领导暴跳如雷，认为他抗拒劳动，是大逆不道，就死命找他的碴儿。“五一”节他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内有“身在威宁，心在北京”之句，显然是在表达他多么想念党中央。这下辫子给军宣队抓住了，便批判他不安心劳动。后来北京调他回去，调令也被扣住。这位可敬的诗人始终也没有回首都。他一肚子委屈，躺在床上喝闷酒抽烟，燃着了被头。套用托尔斯泰的话：人诞生时的情况大致都差不多，死法可就千变万化了——尤其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

诗人就这么饮恨而死。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当年的向阳湖畔为他竖立一座诗碑，在表彰这位有侧隐之心的共产党员的同时，也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

郝孚逸

实话实说话“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干部学校”。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培养干部，供干部学习的场所。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谈谈情况。

—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文化部有两个干校，一个在天津静海，一个就设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我们是1969年下干校的，从到干校的第一天起，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之中。

本来，有十几个部打算在向阳湖办干校的，但他们看到这儿的的情况以后，大部分改变了主意，到别的地方选点去了。只有文化部“五七”干校仍决定设在向阳湖，据说文化部在所谓“文艺黑线”的专政下，是“烂掉”的单位，必须在艰苦劳动中脱胎换骨。当时，国家花了一笔钱，修建堤坝，围了一大片湖区。除了湖区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劳动就从买材料、盖工棚、垒炉灶、修道路、搭猪圈等开始。当时，买什么东西都要拉车跑汀泗桥。伙食是每人每月交12元，因为开头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靠买，所以平均每天四毛钱的伙食钱，就只够常常啃老倭瓜了。

咸宁干校的学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共有好几千人，分为五个大队、二十六個连队；文化部机关编为四个连队即一、二、三、四